

巴金的《憩园》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¹

(法) 唐吉·拉米奥 著
江 蕾 译

中国文人了解卢梭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卢梭对于二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政治基础的理论家，还是一个抗争和受难的个体，他在书中倾诉了他的抗争和苦难，而年轻的文人在读书时，仿佛在书中读到了自己。郁达夫把他定义为“反抗的诗人，自由和平等的捍卫者，大自然的骄子。”巴金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双重的影响。1981年，在发表于上海的一份杂志中的文章里，他向他的老师鲁迅先生致敬，写道：

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²

此处巴金对鲁迅的描写完全符合卢梭的“为真理，献生命”的座右铭。事实上，卢梭吸引中国，乃至亚洲的广大民众是因为他的真诚，因为民众对其思想、行动、生命和想法的赞同，读者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苦难的、与社会斗争的作家形象，如同启蒙时期的众多哲人一样：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虽然生活清贫，但是恪守原则。

在巴金的书和文章中，我们能经常读到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其梦幻、奇特的氛围，这个场景仿佛发生在神话中：

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我和卫从夜校出来，走在小雨打湿了的清静的街上，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中看见了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摸冰冷的十座，就像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记了我的痛苦，一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的時候。³

《我的眼泪》是发表于1931年的一部小说，在书中他也描述了相同的场景：

¹ 这篇文章是“卢梭在亚洲”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是关于卢梭在越南和越南小说家黄玉珀（1896—1973）及其小说《一颗纯洁的心》，2009年，发表在《卢梭研究》第十七卷中。

²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随想录》。安热尔·皮诺（Angel Pino）从中文翻译。巴黎，Bleu de Chine 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³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灭亡》。由安热尔·皮诺（Angel Pino）和何碧玉（Isabelle Rabut）翻译。巴黎，Bleu de Chine 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这篇文章首先于1932年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之后结集于1935年出版《巴金自传》。由翟梅莉（May-lee Chai）翻译，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关于巴金和法国及他在法国的岁月的报道，请参看刘秉文（Liu Bingwen），《巴金和法国》，比较文学的博士论文，由达尼埃尔·H·帕诺（Daniel H. Pageaux）指导，巴黎三大，1992年。